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11

1975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11

197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总第十一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17,000

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93 定价: 0.38元

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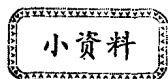
目 录

• 社 会 学 •

社会学——苏修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叶伯乐 (1)

苏联的社会学〔美〕策夫·卡茨 (5)

为谁服务的社会学〔美〕梅尔文·克罗恩 (30)



小资料

社会学在苏联复辟略历 (33)

苏联社会面面观之二 北京大学俄语系
复旦大学外语系等 (35)

画配诗：苏联社会形相 (67)

• 经 济 危 机 •

未免言之过早江云 (70)

资本主义的末日来临了〔英〕巴巴拉·伍顿 (74)

经济衰退还将继续下去〔美〕劳工研究协会 (79)

欧洲：哪里有什么好转？〔美〕苏珊·弗雷克 (82)

西德经济依然毫无生气〔美〕《商业周刊》 (86)

日本经济的痛苦调整〔美〕《商业周刊》(90)

恢复充分就业的漫长道路〔美〕刘易斯·贝曼 (98)

• 印度社会问题 •

谁在剥削和掠夺印度人民? (107)

印度〔美〕伯纳德·温劳布 (108)

生活在紧急状态之中〔英〕安德鲁·达文波特 (118)

印度的贪污〔英〕L·帕尔米尔 (121)

苏联援助印度的内幕

.....〔印度〕纳拉扬·布哈塔查理雅 (126)

印度的土地危机〔美〕盖尔·欧姆维德 (131)

*

*

*

苏联渗入比利时经济〔美〕《前卫》周刊 (141)

波多黎各是天堂之岛吗?〔美〕《前卫》周刊 (143)

谁最先发现美洲大陆〔美〕彼得·格温 (147)

书评

读《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

.....〔日〕杉野明夫 (152)

书刊简介

《青年国际主义者》 (157)

苏联史学·出版动态

社会学——苏修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叶 伯 乐

读完本期摘译的策夫·卡茨的《苏联的社会学》这篇文章，仿佛看到了社会学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在苏联大肆泛滥的一个轮廓。社会学是一个什么东西，通读全文，大致也可以了然。

社会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日益腐朽、反动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土壤上长出来的一株大毒草。它的使命就是妄图维系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意识到它是有用的工具，可以有助于”“使现存制度更加合法化和更加永恒”，“取代马列主义的地位”，因而拚命抓住社会学这根救命稻草，强化对苏联人民的法西斯专政，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无怪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要欢呼社会学在苏联“获得新生”，“成为最活跃的科研领域之一”，“水平不亚于其他国家”……。正当社会学在西方陷于破产境地的時候，苏修叛徒集团却把痼疽当作宝贝，其更加腐朽、更加反动的程度，也就可以想见了。

卡茨是西方的一位社会学家，他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看到苏修复辟社会学的若干情况。

首先，社会学在苏联，是公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精神贵族为了复辟社会学，一直鼓吹“世界上有很多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马列主义的科学原理不相适

应”。这就是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一九六六年，在苏联明斯克召开的所谓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的社会学学会会议上，正式打出反列宁主义的旗号，提出“列宁的阶级定义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证明，社会学是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卡尔·马克思》）苏修的社会学，尽管“吸收了现代西方的整个概念结构”，照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所谓“民意测验”、“书面征询”，但是一概不去揭露苏联存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存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严酷的现实，相反，倒是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现实，因此，它的伪科学性是十分显然的。

其次，社会学在苏联，完全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据卡茨说，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变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用‘社会的政治组织’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不仅仅是采用社会学的名词术语问题，而是反映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已被颠覆，法西斯专政猖狂肆虐的现实。这种社会学，“它不敢触及到权力机构和领导核心，这是不能碰的禁区”。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的共同特征，不过在苏联法西斯专政下尤其突出。对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那是社会学万万碰不得的，因为这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命根子。而“有利于统治集团方面的工作都搞得很活跃”，“对党的政策制订者”“发挥了微妙的深远的影响”。至于搞点所谓社会调查，装模作样地揭露一点不大不小的缺口、不痒不痛的矛盾，苏联社会学当然要干一点，但是本质上都是为了“有效控制社会”，修补苏联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机器。列宁在揭露米海洛夫斯基这个俄国社

会学家为沙皇政府效劳的罪恶时指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能够满足人类天性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奴役多数这种不合‘人类天性’的现象为基础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苏联社会学对于苏联“少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奴役“多数”苏联人民的事实，从根本上是讳莫如深的。这就难怪苏修叛徒集团要把社会学“当作有效控制社会的方法和使（法西斯）制度合法化的工具”了。

第三，社会学在苏联，已成为一小撮精神贵族“飞黄腾达的阶梯”，因而更加无耻，更加堕落。卡茨说：今天，“苏联年轻的知识分子阶层对社会学特别感兴趣”，“这门新的有价值的科学”，“为新信徒们创造了飞黄腾达的机会”；“许多青年人都把社会学看成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未来的高潮’。”这是很自然的。社会学既然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是促使苏联社会总概念根本改变的一个主要因素”，“在社会学影响下的苏联社会思想，已经变得更加诡辩和更加适应当前苏联的现实生活了”。社会学对苏修有这么大的“功绩”，那些所谓社会学家当然会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的宠儿。其实，这些人只是一小撮，是苏联知识分子的右翼。“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物以类聚。这些人充当勃列日涅夫之流的马前卒，不但掀不起什么“未来的高潮”，只能炮制出一股混浊的逆流，到头来必然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的殉葬品。

社会学对我国并不陌生。旧中国不必说。自从一九五六年苏修派出代表出席国际社会学第三次会议以后，我国就有一些坚持复辟社会学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跳了出来，配合苏修复辟

社会学的逆流，叫嚷要用社会学“来丰富历史唯物论”，妄图使社会学成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这件事说明，“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正因为这样，批判苏修，批判社会学，同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也就有密切的关系了。

苏联的社会学

〔美〕策夫·卡茨

〔内容提要〕 本文作者是美国研究苏联社会学的“权威”。他写过很多关于苏联社会学的文章。这是其中一篇的节译。

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为什么会在苏联“复活”？它主要介绍了苏修叛徒集团如何通过“学者”、“教授”在苏联推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简况。这是全文的引言。第二部分是，从阶级结构、社会分化、等级、教育、异化、青年问题、种族关系等几个方面对苏联现状进行了一些揭露和分析。第三部分是结论，它揭示了苏修叛徒集团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分析了社会学在苏联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由于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不可能透彻地说明苏联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发生的社会问题的实质。但是，文中所引用的苏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对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苏联社会的矛盾，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苏联，社会学长期被打入冷宫，近十五年来又逐渐获得了

新生，并已成为最活跃的科研领域之一。苏联经常派遣代表出席研究社会学的国际性会议。在方法论和概念论方面，特别是在运用高等数学和模式结构方面，苏联第一流学术中心的社会学家所达到的水平不亚于其他国家。

在西方，很少有文章论及这种有意义的变化。本文所要研究的是社会学在苏联为什么会获得新生？社会学研究哪些主要内容，结果怎样？最后，社会学发展对苏联社会可能会带来哪些变革等方面问题。

为什么社会学会获得新生？

问题的主要答案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所经历的变化。斯大林的继承者依靠所谓科学方法，求助于社会学的探索，通过对社会结构、动机、行为等方面科学的调查分析，作为有效控制社会的方法和使制度合法化的工具。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的有效工具才得以复活。

过去，长期来的隔绝政策，割断了苏联科学和世界科学发展的联系。这种政策的削弱，也是导致苏联社会学有所进展的一个原因。在斯大林逝世后几年，一个由老理论家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参加了一九五六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社会学大会。原来，他们自以为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但在会上他们却发现不仅在西方，而且，某种程度上象波兰这样的东欧国家事实上也已存在了新的社会学。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自然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苏联学者如果不掌握它，就不能在这一领域内作出任何的贡献。因此社会学在苏联的发展，就更为迫切了。

还有一个不太愿意公开承认、但极为重要的原因。十月革命

胜利后半个或多个世纪以来,苏联的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新一代的高等院校的师生、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普遍认识到世界上有很多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马列主义的科学原理不相适应。从长远看,这些马列主义原理可能有效,但却不能用来研究当前社会的实际变化。他们认为西方搞的那一套社会调查的先进方法是不可缺少的。甚至说,在一个中央集权、全面计划化和工业化程度这样高的国家内,搞社会调查比西方的自由竞争国家更有必要。

今天,有科学头脑的苏联年轻知识分子阶层对社会学特别感兴趣。这门学科的研究课题对他们来说是新鲜有趣的东西,消除了过时的教条和陈词滥调。他们通过系统搜集资料,加工整理数据,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对有关的社会现象作出精确计算,从而对社会发展获得“客观”的分析。这门新的有价值的科学,不可能为苏联党的职业政治家和老一辈的“社会科学家”所掌握,这就为新信徒们创造了飞黄腾达的极好机会。

阶级结构

在当前的苏联,社会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有领域它都涉及到了,但没有一个领域搞彻底,这是因为它受到限制、偏见和审查的关系。总的来说,它不敢触及到权力机构和领导核心,这是不能碰的禁区。在很多重要领域,如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动机、业余生活和工作效率、家庭生活、青年的志趣和问题、都市化问题、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以及宣传工具、科学的经营管理、宗教和文化等社会学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客观研究。总之,有利于统治集团方面的工作都搞得很活跃。

然而,苏联的社会学家还是冲破了不少的限制和禁忌,深入

到某些对马列主义学说关系重大的领域，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社会结构问题。人们都知道，苏联自称是“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早已消灭了，但尚未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苏联人认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决定阶级的重要因素。目前，既然存在着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以，在苏联社会就只有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庄员两个阶级。不参加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阶层”，它不依附于任何所有制，因而不能单独成为一个阶级，只能是成为为两个阶级服务的一个阶层。^①

尽管苏共拥有对列宁主义名言重新解释或修正的权利，但是，这个过分简单化的官方理论，却于一九六六年在明斯克召开的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社会学学会会议上遭到了批判。有些社会学家提出，列宁的阶级定义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还提出修改阶级结构官方理论的多种标准，建议取消迄今为止的某些公认的社会成分，或者相应调整某些阶级成分^②。从那次会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发言者总是首先说明列宁的观点，然后加上各种限制性的表述，实际上就使得原先赞同的观点难以站住脚，而不得不加以改变。

Ю·В·阿鲁纠尼安在他写的一篇关于苏联农村人口调查报告中所暴露的观点很能说明问题。他一开始就“接受”了阶级划分的官方公式，把国营农场农民划成“工人阶级”，把集体农庄

① И·А·斯捷潘连和 В·С·谢苗诺夫主编：《苏联的阶级、阶层和集团》，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版第一三六到一四三页。

② 关于明斯克会议讨论的情况，可以参阅一九六六年第五期《哲学问题》第一四三到一五四页；一九六六年第三期《哲学》第一三三到一三八页；斯捷潘连和谢苗诺夫主编上引书，以及他们主编的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一书。

庄员单独划分为完全不同的“集体农民阶级”。继而根据他的调查材料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在工资待遇、劳动态度、工作条件和文化程度等等方面，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机械操作工之间的差别很小，而机械操作工和两种所有制中的田间农业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却非常大。可是，在官方理论指导下，却把农场的机械操作工划为工人阶级，而把农庄的机械操作工划为农民。^①

另一个苏联专家 O·H·阿尔捷罗维奇，也对当前根据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划分阶级的原则是否仍有效，提出了同样的挑战。他认为阶级差别的消失，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两种所有制的差别消失。接着他说：“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次要的，并不是第一位决定性的特征……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并不总是事先决定不同阶级的出现。”^②

被苏联划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使以往官方划分阶级的理论成为过时了。二十年代知识分子阶层在苏联在职人员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一九五九年它已上升到百分之二十点五，工人占百分之四十八，集体农民占百分之三十一。一九六八年它又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五以上，工人的比重维持在百分之四十八点二五，集体农民则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五。目前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已达三千万，和一千八百万集体农民相比，它的比数是二十八比十七。一个苏联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将超过工人阶级的人

① 阿鲁纠尼安：《农村人口的阶级划分》，转引自《当前苏维埃报刊文摘》，纽约，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

② 斯捷潘连和谢苗诺夫主编：《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结构变化的若干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

数。^①

很明显,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官方的教义,特别是和社会主义社会通常把工人阶级看成是领导力量这一说法越来越自相矛盾了。有些苏联社会学家试图“保留”工人阶级的地位,不致于被知识分子阶层所超过,并且使原有的教义能和现实状况相一致,曾提出:工厂的所有技术专家,与其说他们是脑力劳动者,倒不如说他们是体力劳动者;与其说他们是知识分子,还不如把他们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可是,有些人反对;有些人则坚决主张目前按职业划分的结构较之阶级结构更加重要了。^②

社 会 分 化

苏联最近的社会学调查,不仅对既定的阶级结构,而且对官方认为苏联的阶级差别正在逐步缩小、并已大踏步走向单一的无阶级社会的论点,都提出了疑问。和官方论点相反,社会学家的调查结果揭示了苏联在各个社会集团方面不仅有差异并经常存在着集团利益的矛盾。因而,社会变成更加多样化并且阶级分化正在日益加深。^③

① Ф·А·阿拉卜-奥格勒主编:《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进步》,莫斯科思想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八到十页。

② М·Н·鲁德基维奇:《关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层的概念》,一九六六年第四期苏联《哲学》双月刊第二到二十二页,以及斯捷潘连和谢苗诺夫主编:《苏联的阶级、阶层和集团》,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第一三六到一四三页。

③ 鲁德基维奇:前引书;以及他写的《知识分子增长的社会根源》,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第九期美国《当前苏维埃报刊文摘》;《六十年代苏联社会结构的数量变化》原刊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版的《社会主义差别》第三期第五到十九页;О·И·什卡拉洛:《苏联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转引自一九六八年第十二期,美国《当前苏维埃报刊文摘》。

承认拥有各自特殊利益的社会集团的存在，并且它们既互相发生矛盾，也和整个社会“共同利益”发生矛盾，这就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由于正统的马列主义原理认为：工人阶级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因而不存在任何利害冲突。这就导致苏联理论家们对既定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有趣的补充解释。例如 С·С·维什涅夫斯基于一九六七年写道：“人民的普遍利益和阶级利益是一个复杂的辩证关系。承认人民的普遍利益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客观上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的普遍利益是和阶级利益完全相同的，或者说阶级利益必须从属于人民的普遍利益。”^①

其他，如 Г·Ф·拉维尔契夫为了摆脱困境，争辩说：“非基本阶级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利益，可能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利益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除去工人阶级利益是和整个社会一致外，还存在着许多阶级、集团……集体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矛盾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它的起因决不能只归之于资本主义残余。”^②

这些发展表明：在社会学影响下的苏联社会思想，已经变得更加诡辩和更加适应当前苏联的现实生活了。现在还很难看到这种新观点是怎样论述一个复杂多样化的社会阶层和不同利害关系的集团，是怎样跟苏联官方所宣称的正在稳步走向无阶级社会能完全一致起来，它们又怎样和官方所想象的“苏联人民在思想上、政治上一致”的言论相吻合。然而，经过莫明其

① 《科学的社会管理》，莫斯科思想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第一八三到一八八页。

② И·Л·马林柯主编：《关于社会主义管理的科学原则》，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第一三〇到一三二页，第一六九页。В·阿法萨谢夫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二八四页。

妙的特殊的辩证加工，苏共党内理论家很快就抓住了苏联社会内仍然存在着利害关系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根源在于社会主义的论点，从而为党的统治找到了新的辩护。因而，象拉维尔契夫，就把社会主义发展的这种新特点看成是“政治调节制度”存在的理由，并说：“科学的政治思想体系（马列主义）同政治组织（党和国家）一道，才能保证全体人民利益永远置于首位。”

等级和教育

官方宣称苏联社会阶层不存在等级制度的差别，在城市产业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之间假如仍然存在着什么“差距”，或者这两种集团和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如果仍然存在着什么“差距”，那末，这也是很快就会克服的。但是，同这种说法相反，社会学家的调查发现，苏联社会明显地趋向于等级分化，它表现在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公平。

社会学家访问了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年，听取了他们个人对两种前途的选择。高中毕业后随即参加工作，还是继续读大学为自己谋取较有吸引力的职业。在新西伯利亚城经过连续四年（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广泛调查的一份典型调查报告，很能说明问题。这份报告是作为国际社会学大会的会议文件而散发的。表一（见第十三页）综合指出：被调查青年中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工农子女要求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能够如愿以偿的还不到百分之五十。另一方面，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阶层子女希望进入大专院校，三分之二以上都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一九六五年根据新西伯利亚被调查青年的家庭社会职业类别划分的一份早期调查，其间的差别就更明显了（见表二）。